

恍惚斋

A THOUGHTFUL ESSAY ABOUT

SONG DYNASTY

两宋史

随笔

张邦炜 著

科学文献出版社
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张邦炜
著

恍
惚
斋

两
宋
史

随
笔

A THOUGHTFUL ESSAY ABOUT
SONG DYNASTY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恍惚斋两宋史随笔 / 张邦炜著. --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-7-5201-3274-9

I. ①恍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宋代-文集
IV. ①K244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5794 号

恍惚斋两宋史随笔

著 者 / 张邦炜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高振华

责任编辑 / 高振华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区域发展出版中心 (010) 59367143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3.5 字 数: 352 千字

版 次 /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201-3274-9

定 价 / 69.00 元

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-59367028) 联系

▲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笔 谈

书中自有问题在 / 3

史事尤应全面看

——关于当前宋史研究的一点浅见 / 11

战时状态：南宋历史的大局 / 20

体系意识：以唐宋变革与南宋认知为例 / 30

历史学如何算起来？

——从北宋耕地面积、粮食亩产量等数字说起 / 36

札 记

钱大昕：大有功于宋史研究的乾嘉巨子 / 47

关于宋代避讳

——研习钱大昕著作的一个读书报告 / 78

宋代“平民社会”论刍议

——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 / 90

启迪与不解

——研习钱穆论著读书报告之二 / 101

序 跋

专题探讨、断代考察与综合研究

——《婚姻与社会·宋代》引言 / 113

从婚姻的角度看唐宋变革

——《婚姻与社会·宋代》结语 / 117

宋代的内朝问题及家天下统治

——《宋代皇亲与政治》导言 / 121

宋代既无内朝又无内乱的关联和缘由

——《宋代皇亲与政治》余论 / 138

学贵自成体系

——《宋代婚姻家族史论》后记 / 162

有关宋代政治及文化的点滴管见

——《宋代政治文化史论》前言 / 165

从选题的大小说起

——《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》后记 / 169

书 评

宋辽金元史研究的新成果

——读《中国史稿》第五册 / 177

《宋代四川经济述论》评介 / 180

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 / 183

嘉惠学林 流传久远

——《全宋文》评介 / 211

蓄之既久 其发必厚

——读王曾瑜新著《宋朝阶级结构》/ 218

读《吴天墀文史存稿》/ 224

黄宽重《宋代的家族与社会》读后 / 230

忆 旧

蒙老叫我读《文鉴》

——为纪念蒙文通先生 110 周年诞辰而作 / 249

风范永存：缅怀邓广铭先生 / 255

令人怀念的“三严”史家

——我所认知的邓广铭先生 / 258

特立独行的思想型史家

——纪念金宝祥师百岁诞辰 / 262

川内开花川外红

——缅怀吴天墀先生 / 271

一位对宋史研究有特殊贡献的长者

——忆程应镠先生 / 279

我所知道的“江安黄家三姊妹” / 286

无私无畏的益友

——恭贺朱瑞熙教授八十大寿 / 297

成名于改革元年的学者

——庆贺王曾瑜先生八十大寿 / 302

置身功利外 心在学问中

——怀念刘浦江教授 / 306

自 述

研习宋史：我的自主选择 / 313

文坛巨匠·驼峰英烈

——我所崇敬的两位下江人 / 341

我家与抗日 / 346

西行万里到拉萨 / 350

在政协中领悟政协 / 356

为人沉稳 待人宽厚

——缅怀李文珊同志 / 361

后 记 / 365

| 笔 | 谈 |

书中自有问题在

治史难，既难在史料的搜集与解读，又难在问题的发现与提出，如何处理问题与体系的关系也难。下面仅就宋史研究的材料与问题谈些浅见，主要意思不外“三个并重”：新、旧材料宜并重，书与问题应并重，问题与体系当并重。

一 “精于一”过时否？

“比上有余，比下不足。”这八个字大致概括了宋史史料的数量特征。由于“比上有余”，治宋史者无“巧妇无米”“山穷水尽”之感，有待开掘的材料和问题很多。因为“比下不足”，治宋史者无“老虎吃天，无处下手”之叹，“竭泽而渔”的愿望有可能实现。无惊人的新材料的发现则是宋史史料在质量上的主要特征之一，难怪治宋史者既倍加注意新材料的扩充，又格外注重对旧材料的利用^①。如果说上古史研究者对于“地上二十四史”

^① 陈寅恪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》称：“一时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”（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，第236页）此言不应成为轻视旧材料的依据。其实，未经充分利用的旧材料也可视为新材料，对旧材料还可做新解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陈寅恪曾强调“群经诸史”即旧材料的重要性，其《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》称：“群经诸史，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。”（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，第230页）他的代表作以征引基本史籍为主，吕思勉等史家将旧材料作为主要研读对象，以博学著称的余嘉锡自称“读已见书斋”，有《读已见书斋随笔》传世（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，第642~681页）。

与“地下二十四史”曾有厚此薄彼之争^①，那么治宋史者则无“不看（地上）二十四史”即现存基本史籍的可能。可是传世的宋代史料数倍、数十倍于前代，研习宋史究竟从何入手？从前，学界名宿多半如是指教后学：“自‘精于一’始。”鉴于此说如今几乎成为老皇历，大有被颠覆之势，因而有必要旧事重提。

“精于一”之说，出自黄庭坚《与李几仲帖》：“泛滥百书，不若精于一也。”朱熹对此深表赞同：“一件看得精，其它亦易看。山谷《帖》说读书法，甚好。”^②“精于一”具体到研习宋史，是指首先在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以下简称《长编》）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、元朝官修《宋史》等宋史基本史籍中任选一部认真通读，以选择《长编》者居多。对于“精于一”，前辈学者的两点阐释值得重视。

其一，“精于一”是个长过程。《长编》等书部头都很大，要掌握它，谈何容易，只能采用八面读书法。八面读书法又称“八面受敌法”，源于苏轼《又答王庠书》^③，意思是书应当多读几次，每次既全面思考，又有所侧重，集中精力关注一个方面的问题。苏轼说：“吾尝读《汉书》矣，盖数过而始尽之。如治道、人物、地理、官制、兵法、货财之类，每一过，专求一事，不待数过，而事事精核矣。”^④此乃苏轼精读《汉书》的经验之谈，显然也适用于研读《长编》等书。

其二，“精于一”仅仅是开始。朱熹强调：“读书之要，循序而渐进。”^⑤应当在“精于一”的基础上，有计划、分步骤地广泛阅读各种史籍。以先读《长编》者为例，此后可考虑分三步走：一是继续通读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《十朝纲要》《靖康要录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《中兴两朝圣政》《续编两朝纲目备要》《宋史全文》《宋季三朝政要》等编年体史书，

① 参见罗志田《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0年第4期。

② 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卷10《读书法上》，王星贤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94。

③ 苏轼：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46《又答王庠书》，四部丛刊初编本。

④ 杨慎：《升庵集》卷72《苏公读书法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⑤ 朱熹：《朱子大全》卷74《读书之要》，四部备要本。

以期基本把握宋代历史演变的总进程；二是研读《宋史》诸志，如《食货》《职官》《地理》《选举》《刑法》《兵》等，并将《文献通考》《宋会要辑稿》《玉海》等书中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读，以期大体掌握宋代的典章制度；三是结合有关课题，广泛查阅宋人文集、笔记、方志、类书、金石等各种材料及文物、考古资料，以便从中领会搜集和解读宋代史料的基本方法和手段。上述步骤也可齐头并进。

倘若按照学界名宿的指教，从“精于一”始，并“循序而渐进”，定能打下坚实的基础。然而据说当前在知识“爆炸”、电子技术普及的新形势下，“精于一”是个笨办法，事倍功半，已无必要。可是，我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教训，至今仍认为基本史籍非通读、细读不可，否则会闹笑话。试举两例。

例一：宋太祖生前是否留下遗诏？我在《宋代皇亲与政治》一书中断言：“宋太祖没有留下传位遗诏”^①。稍后在《文史哲》上读到《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》^②一文才恍然大悟，自己错了。宋太祖有传位遗诏传世，见于《宋会要辑稿·礼二九》。因《宋会要辑稿》（以下简称《会要》）迟至1936年才影印出版且印数极少，前辈学者早年在探讨“烛影斧声”之谜时，未引证《会要》是可以理解的。而我读过此书，只能责怪自己太粗心。至于其真实性究竟如何，是否由别人编造，则另当别论。如《宋会要辑稿·礼二九》所载宋哲宗《遗制》，什么皇弟端王“宜授神器”“皇太后权同处分”之类，分明是由宋神宗向皇后与宰执大臣们在宋哲宗死后临时炮制而成。由此及彼，宋太祖遗诏是否出自他人之手，其可能性很难排除。

例二：唐朝政府是否允许民间办私学？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论定：唐时“学校为官所立，私人不得设立”^③。其依据为元人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46《学校考七》所载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：“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

① 张邦炜：《宋代皇亲与政治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3，第24页。

② 王育济：《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》，《文史哲》1994年第2期。

③ 邓之诚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中册，中华书局，1983，第116页。

私学。”我在比较唐、宋学校制度时发现，此乃“千虑一失”。其致误原因有二：一是断句有误。细读此敕可知，“不得辄使”四字当属上句。二是未对读、校读。“诸”字语义不甚明确，所幸宋人王溥《唐会要》卷35《学校》所载同敕，“诸”作“许”，称：“许百姓任立私学。”于是问题迎刃而解，可见细读基本史籍很有必要。

二 书与问题冲突否？

据说，当前学者应当实现从“以书为本位”到“以问题为中心”的转变。“精于一”是“以书为本位”，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才是“以问题为中心”。如何“攻其一点”？既不必先通读《长编》等书，也不必从“四把钥匙”入手，而是首先全面浏览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所编《宋辽金元史》。浏览复印资料，既可打下基础，又能找到问题。发现问题后，再带着问题，查阅资料，“攻其一点”，立竿见影。人大复印资料无疑应当阅读，回顾学术史也不失为一种发现问题的好办法。但是发现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，诸如听讲而来、检索而来、比较而来之类，不胜枚举。照我看来，书与问题并不冲突，书中自有问题在。告别“以书为本位”之说有害无益，它会“造就”一批从未认真通读任何一部基本史籍的以宋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、博士乃至教授、博导。

所谓书中自有问题在，有两层含义。一层含义是从基本史籍中就能发现问题。这是前辈学者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，我也有切身体会，略举两例。

例一：官田问题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学界有两个较为流行的观点，即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国有制，唐宋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是庄园制。我作为宋史初学者，正按导师的布置，将《文献通考》田赋等考与《宋史·食货志》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结合起来读。导师说，只要认真研读，定能发现问题。我将信将疑。读到官田部分，才深感师说不谬。从书中发现，官府一面多次买民田为官田，一面不时卖官田为民田。官田、民田通

过买卖双向转换，表明不能无视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。同时又发现宋代官田的经营方式经历了从屯田、营田到“召人”租佃或设置官庄的转变，官庄的主要经营方式无非是“召人”租佃。我据此写成作业《论宋代的官田》，对盛行观点提出异议^①。习作虽不足道，但我从中体会到，细读基本史料与回顾学术史相结合是发现问题的最好方法。

例二：榜下择婿。儿时看旧戏，在才子佳人戏里，往往少不了“先登第，后成亲”的情节。后来读《宋史》，成功或不成功的榜下择婿实例纷纷映入眼帘，始知戏里的情节并非纯属虚构。再顺藤摸瓜，广泛搜寻，相关资料越来越多。王安石曰：“却忆金明池上路，红裙争看绿衣郎。”^②苏轼云：“囊空不办寻春马，眼眩行看择婿车。”^③这些诗句便是对这一社会风气的形象描述。实话实说，我起初并不是从文集而是从《古今事文类聚》《记纂渊海》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等类书中读到这些诗句的。鉴于此风的出现、形成和发展，折射出由魏晋经隋唐至两宋，社会从“尚姓”到既“尚姓”又“尚官”，再到“尚官”的变化，我写成《宋代的“榜下择婿”之风》^④一文。可见，发现问题的方法确实多种多样，甚至儿时的记忆也起作用，但关键仍然在于认真阅读基本史籍。发现、提出问题，离不开基本史籍；落实、解决问题，也要依靠基本史籍。

书中自有问题在的另一层含义是基本史籍本身就有问题。众所周知，对于基本史籍，不能一概信从，其中问题很多，甚至真假难辨。如有“铁面御史”之称的赵抃，在《宋史》本传中，所至之处奇迹太多，什么“狱以屡空”“奸民屏迹”“民无饿死”“飞蝗堕水”“匹马入蜀”等。这些夸大乃至虚构的记述，竟源于苏轼《赵清献公神道碑》。足见文人笔下的历史与人所经历的历史差距有多大。从苏轼到《宋史》的编者为什么美化赵抃？按照什么模式塑造赵抃？其效果究竟如何？又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些问题或许琐

① 张邦炜：《论宋代的官田》，《甘肃师范大学学报》1962年第4期。

② 谢维新：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·前集》卷37《科举门·红裙看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③ 祝穆：《古今事文类聚·前集》卷27《仕进部·择婿车》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④ 张邦炜：《宋代的“榜下择婿”之风》，《未定稿》1987年第4期。

碎了些，再举两例。

例一：孟昶的形象。初读以《国史》为蓝本的《宋史》，孟昶在书中是个昏君，其典型证据是“宝装溺器”。相传蜀人《苦热》诗云：“烦暑郁蒸无处避，凉风清冷几时来。”宋太祖据此声称：“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。”^①我因而相信后蜀社会经济凋敝，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后读西蜀士人的著述才发现，官方或半官方的记载不过是为宋太祖的话做注脚，证明他救蜀民于水火。相反，在蜀士看来，后蜀“实天下之强国也”，孟昶“乃天下之贤主也”^②。其主要依据之一是《官箴》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”“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^③这类记述也不完全是事实，无非是其怀旧情绪的流露。其之所以怀旧，是因为北宋前期在西蜀行苛政。后来随着治蜀政策的调整，蜀士的怀旧情绪渐渐烟消云散。何况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，于是孟昶的昏君形象最终压倒其“贤主”形象。可见，孟昶的形象问题不仅是后蜀史上的一大论题，而且其前后演变动态地折射出北宋时期西蜀地区的政情、社情和民情。

例二：宋真宗刘皇后的身世。《宋史》本传载，她原籍太原，其祖、父在五代时曾任高官。但当时几乎尽人皆知，刘皇后“起于寒微”。她是个西蜀女子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嫁与银匠龚美，龚美破产后，将她带到开封，靠在街头卖艺为生。为掩盖其婚史，刘皇后认龚美为兄长，改姓刘，称刘美。为遮掩其家世，她曾自称河中人氏，又称籍贯洛阳，一再与大臣认本家，均遭拒绝^④。她竟正位中宫，既可作为北宋“婚姻不问阀阅”的事例，又是当时贞节观念不重的例证。但所谓“阀阅”并不等于门第，刘皇后急于攀名门、认兄长，并竭力掩饰其系再婚，又表明当时门第观念、贞节观念都不轻。

① 文莹：《玉壶清话》卷6，郑世刚、杨立扬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84。

② 句延庆：《锦里耆旧传》卷3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。

③ 陶宗仪：《说郛》卷17《野人闲话·颁令箴》，中国书店，1986年影印本。

④ 参见张邦炜《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》，邓广铭等主编《宋史研究论文集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1993，第576~606页。

三 问题与体系兼容否？

当前，学界往往突出强调问题意识，避而不谈体系意识，甚至将学者分为“做问题”的与“做体系”的，并一味赞赏前者而贬低后者。其实，所谓体系意识，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体观、全局观是同义语。体系与问题的关系近乎于整体与部分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，两者不是绝对对立，而是互补互济。“以小见大，陈寅恪之谓也；以大见小，吕思勉之谓也。”前辈学者早已率先垂范，为我们树立了两者结合的典范。所谓“小”是指较为具体的问题，而“大”则是指较为抽象的体系。将问题与体系结合起来，至少有两大好处。

其一，有利于学科体系的建设。急于构建体系、选题大而无当是初学者容易犯的一种错误。早在20世纪40年代，学子以《宋代妇女的地位》作为学位论文题目，受到前辈指教：“择题稍嫌笼统”，“不易作专题深入之研究”^①。本人也曾以《中国封建时代的家庭制度》《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特征》等作为论文乃至短文的论题，这些都是教训。然而并不是说大题目不能做，应当放弃构建学术体系的追求。吕思勉便着眼于“大”，其学术旨趣是“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”，治学以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见长。同时吕思勉又着力于“小”，注重研究具体问题，舍得在排比史料、分类札记上下功夫，有总计762条，100余万言的三大册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做证。吕思勉的两部中国通史、四部断代史就是在这些考论性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。他以大见小、大小结合的学术理念和实践，为当前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范例。

其二，有利于增强问题的牵动力。问题流于琐碎、选题无关宏旨是初学者容易犯的另一种错误。从前，前辈学者往往以“明成祖的生母”“洪秀全

^① 徐规：《仰素集·序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，1999，第3页。

的胡子”为例，告诫后学。明成祖是嫡出还是庶出？其生母究竟是碩妃还是达妃？洪秀全有无胡子？他长的到底是“一”字胡还是“八”字胡？这类问题虽然不能说绝对不应研究，只怕意义相当有限。但陈寅恪见识非凡，他讨论“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”，看似琐碎，与明成祖的生母、洪秀全的胡子似乎并无二致，但他赋予这一议题深刻的学术蕴涵，以此说明唐朝的婚制与伦理，并进而涉及唐代的种族与文化。在他看来，“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之所在”^①。陈寅恪化琐碎为深刻，关键在于他以小见大，见微知著。可见，只有树立“体系意识”，才能恰当地区别核心论题与边缘论题，分清主次，抓住关键，通观明变，揭示底蕴，增强问题的深度和牵动力。

总之，无论是陈寅恪还是吕思勉，都是体系意识极强的史家。我不甚理解的是，如今学界大多肯定吕思勉，颂扬陈寅恪，但为何又往往忽视甚至贬低体系意识。至于本人，至今仍相信那句老话：“学贵自成体系。”

（原载《史学月刊》2009年第1期）

^① 陈寅恪：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三联书店，1956，第1页。